

# 以人文精神引导大众文化消费需求

□王力平



文学艺术要满足大众文化消费需求,同时也要参与人文精神建构。这是一个不可偏废的、对立统一的整体。但二者在现实中的“对立”是显性的,理论上的“统一”则是隐性的。这种认知几成共识,但依笔者不成熟的看法,这其实只是一种刻板印象。

在人们印象中,满足大众文化消费需求的是通俗文学,因而文艺的消费属性被概括为“俗”。正面的说法是通俗,负面的说法是庸俗,至于低俗、恶俗,已在鞭笞之列。相反,承担人文精神建构责任的是纯文学,是文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之所在,因而被视为“雅”,即文雅、优雅、高雅。由此形成了通俗文学之俗与纯文学之雅的对立。其实,通俗文学是一种类型化写作,一般会顺应大众的情感和价值取向,比如惩恶扬善、急公好义、英雄主义,等等;会选择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达方式,比如塑造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设计曲折生动、悬念迭生的故事情节,等等;会深耕大众关注的题材领域,比如侦探、悬疑、言情、仙侠、商战,等等。不难看出,类型化写作同样需要有思想性、艺术性的追求和造诣。相对来

说,纯文学是一种个性化写作,它注重个人经验和感受,注重独到的思想见解和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个性化写作在艺术创新方面有更强烈的内生动力,但个性化写作并不能天然地对庸俗、低俗免疫。

事实上,雅与俗固然有别,但雅与俗也是相通的。雅与俗的区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比如古典诗词,今天公认是高雅艺术。但在当初,诗是庄严雅正的,要满足言志抒怀的需要;词是轻松游戏的,要满足歌台舞榭、清乐宴乐的需要。所以词是“诗之余”。词的出现,一方面是城市、商业以及市民社会的发展,带来大众文化娱乐需求所致。另一方面,也是从四言、五言到七言,从辞赋到歌行的诗歌传统孕育涵养的结果。前者是世俗,后者是文雅。雅的文学传统与俗的现实需求,在唐宋之交,携手成就了词这种新的文体。

再比如小说。作为叙事艺术,小说的源头可以上溯到远古神话传说,经由先秦两汉寓言和史传传统的过渡,到魏晋时代,出现了“志怪”“志人”小说。前者记述神异鬼怪,后者记述人事逸闻。虽然作者自认为是“纪实”,但从“史笔如铁”到“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其中已包含了由正史到野史、由雅到俗的嬗变。经此一变,不仅与史传传统有了“文”“野”之分,和诗词歌赋相比,也有了雅俗之别。其间,经过唐变文、传奇以及宋元话本等不同阶段的发展,到明清时期,始有文人介入,开始对三国故事、水泊梁山好汉故事以及唐三藏西天取经故事进行整

理和创作,但其通俗性、大众性、民间性没有根本改变,直到《红楼梦》出现。

鲁迅先生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理由是“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须知,“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这是“扁平人物”塑造的重要特征,也是通俗文学“类型化写作”的常见模式。从话本故事的集体创作,到《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文人增删创作,再到《红楼梦》“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这是小说由俗向雅的演变,也是小说创作中民间大众审美趣味与作家主体精神此消彼长的过程,其间并没有不可跨越的沟壑天堑。

郑振铎先生著《中国俗文学史》,开宗明义写道:“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诗经》因为保存了大量古代民间歌谣,是学界公认的俗文学。但实际上,自汉武帝定《易》《书》《诗》《礼》《春秋》为五经,“置五经博士”起,“诗”字后面加了一个“经”字,再说它“不登大雅之堂”就不准确了。此后,唐定九经、十二经,宋定十三经,《诗经》都名列其中,是百代不易的儒家经典,深刻参与了人文精神和审美意识的建构过程。

可以这样说,雅和俗是相通的,满足大众文化消费需求和参与人文精神建构也是相通的。人为地把大众文化消费功能归于通俗文学,归于类型化写作;把人文精神建构的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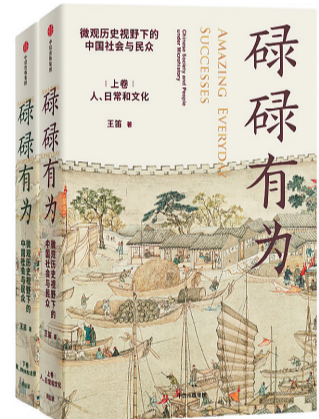
归于纯文学,归于个性化写作,并将这种区分绝对化,是不科学的,也不符合文学史的事实。

其实,雅与俗的差异,大众文化消费与人文精神建构的差异,其背后是社会大众与知识分子对自身文化使命自觉程度的差异。别林斯基曾感叹说:“人民但需要马铃薯,而毫不觉得需要一部宪法。”但问题在于,如果这部“宪法”不能给人民带来更多的“马铃薯”,别林斯基们有什么理由要求人民改变漠然待之的态度呢?相反,如果这部“宪法”能够带给人民更多的“马铃薯”而人民却不自知,别林斯基们的任务,不是应该走到人民中间去,唤醒人民对这部“宪法”的自觉意识吗?

一般化地倡导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两手都要硬”是不够的。今天,对通俗文学、网络文学、影视剧等类型化写作来说,不仅要研究如何顺应和满足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还要研究如何感受、发现、创造和引导大众新的文化消费需求。只有前一个研究,还只是在较低层次上对大众文化消费需求的满足;有了后一个研究,就是建构人文精神的艺术实践。对纯文学的个性化写作来说,不仅要坚持自己的思想探索和艺术创新,还要自觉地以这种探索和创新,去丰富大众文化生活的内内容,开辟大众审美意识的新境界。只有前一个坚持,还只是作家个人思想和艺术素养的锤炼过程;有了后一个自觉,就是丰富和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的艺术实践。

## “显微镜”下的鲜活历史

——评《碌碌有为:微观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



□潘玉毅

了解过去的社会,对今天的普通人来说,重要吗?答案是肯定的。我们今天的文化、传统、习俗、审美等诸多方面,仍然深受过去长期形成的社会行为和传统文化影响。了解过去,我们才能更好活在当下。而通常,我们了解的历史,多是王侯将相、文人墨客、英雄豪杰,少了普通人的生活。王笛所著的《碌碌有为:微观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中信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聚焦微观历史,以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方式,从普通人和普通家庭的故事,逐步延伸至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而展现人口的变迁、农村和城市的形成、人们的风俗习惯、文人与教育、法律与社会、宗族与家庭,等等,让读者看到更多历史中的细节。

该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聚焦“人、日常和文化”,下卷则讲述“家、群体和法律”。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该书的主旨,那便是为凡人立传,为凡俗生活做记录。这也是王笛为传统的宏观历史写作所做的一个补充。一部影视剧要好看,既要有主角也要有配角。历史不只有王朝更替、刀光剑影,真实的历史可能是某个雨天,一群人在屋檐下躲了一会儿雨;可能是暮春时节,“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可能是遇到荒年,百姓流离失所,凄凄惨惨戚戚;可能是为了更美好的生活,扎根第二故乡……

唐人的诗,宋人的词,马可·波罗的游记,久远的民间故事,以及县志、族谱、契约、传统戏曲……作者旁征博引,甚至把《桃花源记》里的故事也当成了分析对象,以此说明移民对区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其余篇章亦是这般。书中援引的资料很多,论证的观点也很密集,但每一个章节,作者的讲述都通俗易懂。虽然说的是历史,却没有传统正史的“高大上”,而是聚焦平凡人的世界,以科普的形式进行呈现,让人读来甚觉亲切,不知不觉便萌生了兴趣。一个地方先得有人,才有后来的发展。“人”从哪里来?除了自然的生长繁衍,移民无疑是其中较为常见且至关重要的一个源头。有了人以后,少不得衣食住行,于是农业、手工业随之兴起,逐渐便形成了集镇和城市。生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与土地、与地斗、与人斗。在这个过程中会形成宗族、文化和信仰,会有面对生老病死的恐惧或从容……作者并未刻意阐释章节之间的关联,但读者通过文本,能够感受到其中的联系与逻辑。

作者讲述的虽是历史上各朝各代的人和事,但让人感觉离自己的生活那么近。他讲衣食住行、人口迁移、审美演变,讲地域与民俗的关系,讲过去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那些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物放在今天仍然适用。正如作者在引言里所说,任何事情都是有历史渊源的,今天何以成为今天,我们的生活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都与过去密不可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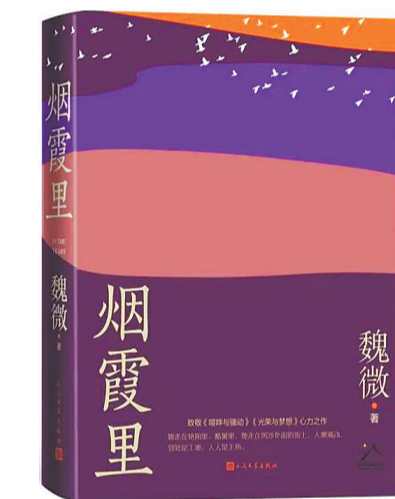
一个平凡人的经历,可以反映整个时代的变化,我们亦可以从有血有肉的“小历史”中真实地感受大时代的转折。如果没有微观视角,我们的历史就是不平衡的历史、不完整的历史。看历史就像看电影,会看到全景、中景,但更真实的情景可能来自近景与细节。只有把历史放在“显微镜”下,倾听普通人的声音,才能看到更鲜活、更有血有肉的故事,感受中国社会的烟火与温度。

□李 钊

作家魏微对时代的发展变化有着敏锐的观察,她的创作常以个体微观的人生历程展现时代的发展变迁,其代表作《化妆》《大老郑的女人》《一个人的微澜》等以细腻的生活,揭示普通人在时代浪潮中的命运。她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烟霞里》(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12月出版)则以编年体形式,将女主人公田庄的成长经历与四十年来时代发展的重要事件融合在一起,实现了虚构与非虚构两种文学气质的完美碰撞,完成了个人与历史的对话,给文学处理记忆提供了新的尝试路径和本。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部充满喜怒哀乐的编年史。田庄的编年史里有烟火人间的细枝末节,这些日常生活叙事使田庄的生命体验得到具体可感的呈现。

出生于1970年的田庄,有着乡镇、县城、一线城市等不同地域的生活体验,这些生活地点成为她不同人生阶段的符号:田庄的童年属于李庄和江城,当父母将她从李庄送到爷爷所在的江城后,爷爷教她识字、阅读,使她萌生了对远方世界的向往;她随家人搬到县城清浦,度过懵懂叛逆的小学 and 中学时光,清浦成为她想要逃离却又无法挣脱的符号;她的青春记忆刻



在江城的大学校园,童年生活的温馨过往、未能圆满的校园恋情以及对大城市的憧憬,带给她酸甜交织的生活体验;在广州,田庄成家生女,生活一度如鱼得水,但步入中年后未能逃脱空虚与挣扎,日子过得平直疲乏,终因心梗卒于2011年。她的经历涵盖了许多人的成长轨迹:从乡镇来到县城,离开乡土,成为城里人;南下广州,买房炒股,赚外快,赶上了旧城改造、招商引资、互联网经济,等等。沿着田庄的成长地图,无论是“70后”“80后”还是“90后”,都能在

其中找到共鸣的点。所以说,《烟霞里》实现了对三代人成长的编年。

作为一部以编年体方式书写的文学作品,《烟霞里》必然交代对应年份的时代风云和重大事件,作者查阅权威资料,又融入自身的生活体验和对社会的深刻思考,以1970年为起点,平推起每一年的生活流,直到女主主人公离开。小说中呈现的记忆极易与读者产生强烈共鸣。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20世纪80年代个体经济繁荣发展,90年代出现南下打工潮,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1997年香港回归,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些从田庄身上漫过去的时代浪潮,也同时灌入了我们的生活。田庄个体的生命经由这些体验,与她所走过的历史时间和历史事件完全融为一体,成为一个小小的博物馆,其中有时代声音的回旋,有人们内心的沟壑纵横,有各式人物命运的浮沉,更有默默见证了这一切的街道、建筑和风俗。

流淌在《烟霞里》中的历史事件,依旧深刻影响着人们。作者平静又深情地将所有这些浪潮,灌注在田庄的生命历程中,灌注在小说的章节中。于是,小说在咀嚼吞噬这些资源之后,成长为它自己,并且敞开门,告知它与读者之间的关系:《烟霞里》有我们,有我们的来处。

## 叩问时代生活中的幽微人性

——云舒小说集《K线人生》赏析

□王 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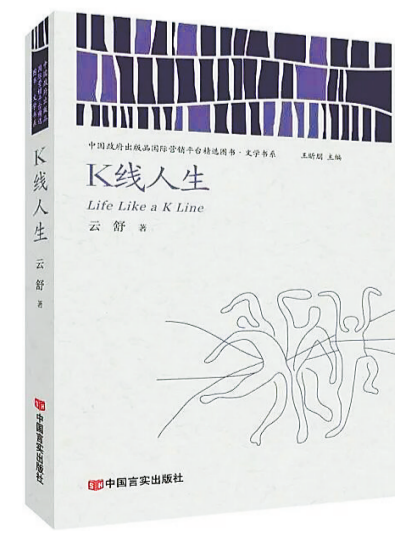
作家云舒擅长以城市生活为底色、以金融界为背景,书写都市人的隐秘情感。小说集《K线人生》(中国言实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收录了《K线人生》《凌乱年》《朋友圈的硝烟》《亲爱的武汉》《青萍之末》《羽翼》六篇中短篇小说。

《K线人生》是作者早期代表作,银行女行长章玉溪历经职场沉浮,深知人性弱点。在她行将隐退时,一份大大小小的职业诱惑不期而至。合作方的急功近利,最终导致众多的人生轨迹化为一条跌宕起伏的K线。《K线人生》是对人生浮沉、企业生存的描摹,更是对欲望的诘问。

《凌乱年》聚焦女性平等这一主题。副行长章清溪决定要讨回公道时,绝不仅仅是做样子。女性在现实生活中具备了乘风破浪的能力,她们面对困难和挑战不低头、不放弃的模样令人敬佩。

《亲爱的武汉》作者用一张被拦腰撕掉的照片,讲述了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武汉女学生的动人爱情故事。真挚的情感在时间的光影中流转奔腾,细腻的笔触塑造出一个鲜活丰满的人物形象。

家庭矛盾、亲情伦理是文学中永恒的主题。小说《青萍之末》充满了对温暖亲



情的期待。小妹肆意而为,“我”则隐忍谨慎,在世沉浮中不断领悟生存之道。作者通过描写主人公的自省以及现实的交锋,积聚向上的力量。在写作手法上,作者没有使用夸大失真的描摹使人物、事件趋于空虚,而是直面现实,捕捉生活中的烟火气息,将“我”推至家庭舞台的中心,塑造出理想家庭的模样,描绘出不同人物在历史洪流中的成长。

在《朋友圈的硝烟》中,作者转而探讨多重关系,以充满悬念的笔触,呈现出

相互猜疑带来的失控局面。作者将人物置于多个线索中,小说的张力逐渐显现。一条陌生的微信引发米兰、深默、许致三人之间的相互猜忌。作者深入闺蜜间撕裂与变形的生活,探究人性幽微处的明与暗。在这篇小说中,作者一改以往清淡的叙事色调,面对对欲望对理智的冲击,人生的色调变得浓墨重彩。

小说《羽翼》聚焦两代人的相处。父亲与初恋再次相遇,却终因对生活的不同选择,而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父亲开明,懂得适时松手牵引子女成长的那根线,令后代羽翼渐丰,学会自由飞翔。初恋林立则牢牢将线握在手中,以为一切尽在掌控,却在女儿远去后跌坐在地,空余慨叹。作者直指两代人之间控制与独立的拉锯战,反思精致城市生活中的家庭教育问题,提出孩子不应是父母的提线木偶,父母应该与孩子一起成长。

云舒是一位具有敏锐视角的观察者,对她所熟悉的都市生活和金融行业进行深入开掘,捕捉普通人习焉不察的瞬间,以不疾不徐的节奏、清新细腻的笔触,或讲述温暖治愈的故事,或剖析复杂的世态人情,或聚焦人们在职场中的困惑迷茫,或书写人性的善与恶……她的创作,正以日渐开阔的视角,穿行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在对时代的关切和深入的洞察中,渐入佳境。



□瞿唯非

作为都市情感文学的代表作家,潘向黎擅长以清新雅致的笔调,描写都市女性的生存状况和情感经历。《上海爱情浮世绘》(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是潘向黎阔别小说创作十二年后,全新回归的潜心之作,也是一部写给都市男女的成长之书。九篇小说,九个故事,映照出当下年轻人摇曳多姿的情感世界和蕤蕤蓬勃的心灵世界。同时,以变幻流动的都市生活浮世绘,呈现复杂的人性和斑斓的世情。

早在小说集《白水青菜》和长篇小说《穿心莲》等作品中,潘向黎就赋予了女人以更加纯粹、更加刚烈的情感守候。女人会在辨认出真爱时毫不犹豫地用生命去守护,而一旦发现爱的杂质又会毫不犹豫地从生活中剥离。后一种复杂心理在《添酒回灯重开宴》中得到细腻生动的演绎。

柳叶渡是典型的上海女性,品位高雅。她与前男友夏新凉因谈论《红楼梦》而分手,夏新凉喜欢袭人,她坚决不接受,认为“会看上袭人的人,无论如何不应该选我,我要是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我怎么对得起我自己”。分手原因貌似幼稚可笑,但体现了柳叶渡的爱情观。柳叶渡所追求的阳春白雪与夏新凉的世俗功利让这段恋爱画上了句号,折射出上海女人“不将就”的情感取向。

对普通人内心诗意情怀的挖掘,饱含着作家对在婚姻生活中尽责却疲惫无助的人们的情感与理解。《睡莲的香气》讲述了男主角在一场恍惚迷离的网恋中,重新检视自己平淡如水的半生,从而生发出想要逃离模板人生的冲动。当极易与读者产生强烈共鸣。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20世纪80年代个体经济繁荣发展,90年代出现南下打工潮,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1997年香港回归,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些从田庄身上漫过去的时代浪潮,也同时灌入了我们的生活。田庄个体的生命经由这些体验,与她所走过的历史时间和历史事件完全融为一体,成为一个小小的博物馆,其中有时代声音的回旋,有人们内心的沟壑纵横,有各式人物命运的浮沉,更有默默见证了这一切的街道、建筑和风俗。

不同于人们印象中时尚喧嚣的一线城市,作者笔下的上海有着鲜活又富有诗意的生命景象。无论日常风物中挖掘上海独特的生活氛围和海外文化,还是在为人处世上海人呈现出的精神图景和价值观世界,作者都以自由疏朗的笔触描摹出一幅线条丰繁、色调浓郁的都市图景。

同名小说《上海爱情浮世绘》流淌着丰沛的文化记忆,既有老八大、凯司令、红宝石等老派地方,也有星巴克、日式餐厅、港酒酒店等中西合璧的现代空间,展示出传统价值理念与现代都市生活的多样性融合,让读者对这座城市产生无限遐想。

在九篇故事中,至少有五篇以吃喝饮饕为背景。饮食男女的爱情,在社交平台,也在一饭一蔬。通过饮食与情感的互动,作者真实细腻又耳目一新地将上海的世态人情落在实处。《觅食记》关注的是都市上班族如何解决午餐的问题,讲述苏充沛和王力勉两位重度脸盲症患者,相约每天一起吃午餐而植下了爱的种子。小说娓娓道出解决午餐的多种模式,展现了现代都市人之间温暖又疏离、理想又现实的情感。《兰亭序》描写一对上海夫妻与儿子前女友之间的一场微妙饭局。本来应该成为一家人,却因为儿子移情别恋而即将成为路人,为了弥补心中的亏欠同时也代儿子体面收尾,才有了一方愧疚、一方尴尬的宴请。小说细腻地表现了上海夫妇面对下一代情感变化时微妙而复杂的情感波动,既表现了富有地方文化特征的价值观念,也展现了不同代际的人在情感观念上的差异性。

《荷花萎》《梦屏》从明暗两个角度叙述男人对婚姻的背叛。婚姻并不都是幸福安逸的桃花源,也会有一系列麻烦、困惑、压力……《梦屏》将三个男人对婚姻的不安以梦境的形式呈现,对他们内心的挣扎、纠结、无力进行了精妙书写。三个梦,折射出三种对待婚姻的态度:或遗憾,或圆满,或患得患失;也折射出藏在现实之下,人心深处的焦虑与疲惫,以及对美好和幸福的向往和追求。《荷花萎》中的神秘男人,对上段婚姻生活心有不甘,无法与“荷花萎”走入婚姻,不得不选择放手。人面不知何处,绿波依旧东流。曾经茂盛过的爱情可能会逝去,但生活依旧滚滚向前。小说令人难忘之处就在于触碰到了人们内心深处灰暗的、明朗的、确定的、模糊的、失望的、渴望的种种复杂的情绪。

小说集《上海爱情浮世绘》是流金岁月的爱情传奇,亦是暗香浮动的上海情书。作者聚焦上海的男男女女,在寻常生活中体察和捕捉都市爱情的百转千回,挖掘和呈现都市世情的丰饶,在人生起伏、情感回环中描摹当代中国青年的生存困境,别出心裁,却也浑然一体。

描摹当代青年生存图鉴

——评潘向黎小说集《上海爱情浮世绘》